

知识翻译学研究

[专题导言]知识翻译学认为,翻译是跨语言的知识加工、重构和再传播的文化行为和社会实践。但知识经过翻译的世界性认同过程,必须经由传播完成、经受技术重构、在具体领域落地、甚至反观自身。本专栏四篇论文,正是对这一追问的四重回应。

杨枫和严程极的论文完成了从“生产”到“传播”的理论闭环。论文将“传播”提升为知识翻译学的核心范畴,揭示“传播即知识建构”——知识不是在翻译中被生产然后被传播,而是生产过程本身就是传播过程。由此构建的“知识流转、话语塑造、效果生成”框架,指向中国知识从“被解释”走向“解释者”的实践路径。

然而,技术条件的变化对这一生产提出了根本挑战。潘艳艳与王晶以西蒙东技术哲学为基石,揭示AI翻译引发的三重重构:主体从抽象到具体的个体化、客体从静态文本到技术生态复合体、不确定性从缺陷翻转为价值场域。其范式意义在于:技术物不再被视为工具,而是参与知识生产的本体性力量。知识翻译学由此在AI时代获得了理论更新。

理论更新必须经受经验检验。张焱以中医学语翻译为个案,将“再地方化”操作化为“审美协商—审美中和—审美共识”的分析框架,并建构中医知识翻译评价体系。这回应了知识翻译学最尖锐的方法论难题:如果衡量翻译的尺度是“存”而非“真”,那么在操作层面如何判定一种知识在异乡的存活质量?

当翻译的对象是翻译话语本身时,知识翻译学进入了自反性层面。魏丽杰的论文揭示,张佩瑶英译中国传统译论,本质上是“关于翻译的知识”自身的跨语际生产。翻译话语也是地方性知识,也需经历再地方化才能进入世界翻译研究的知识星座。这一实践所生成的“中国传统译论”,正是知识翻译学所界定的“单边无法生成”的互鉴价值之直观体现。

四篇论文从理论闭环、技术重构、实践检验到自反升华,构成一个递进的论证结构。它们试图证明:知识翻译学的生命力不在于提供封闭答案,而在于开启一个开放的问题空间,也就是翻译如何让知识在更多的地方活下来?

翻译远未结束。知识仍在生成。

——杨枫

知识翻译学的“传播”功能定位

——兼论中国话语国际传播的效能提升路径

杨枫 严程极

(上海交通大学 外国语学院,上海 200240)

摘要:在翻译研究的理论谱系中,知识翻译学是唯一将“传播”明确纳入翻译定义的理论体系。本文以知识翻译学“五梁十二柱”体系为分析框架,聚焦传播在知识翻译中的功能定位,辨析其与翻译传播学的范式分野,揭示“传播即知识建构”的核心理念。在此基础上,文章构建以知识流转、话语塑造、效果生成为主轴的分析框架,并以中国知识文化的世界性传播实践为目标,探讨知识翻译学为构建中国话语体系、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所提供的理论支撑与实践路径。

关键词:知识翻译学;五梁十二柱;翻译传播;中国话语体系;国际传播效能;知识世界性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6)05-0130-14

DOI:10.26922/j.cnki.waiguoyuwen.2026.05.0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作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知识翻译学理论体系建构研究”(23AWW004)的阶段
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杨枫,男,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知识翻译学研究、外语教育学研究与比较文学研究。

严程极,女,上海交通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知识翻译学研究、外语教育学研究。

引用格式:杨枫,严程极.知识翻译学的“传播”功能定位——兼论中国话语国际传播的效能提升路径[J].外国语文,2026
(5):130-143.



本刊微信公众号

0 引言:从“翻译”到“传播”的理论视域

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然而,一场无声的角力始终在话语的天空中盘旋,那就是西强我弱的国际话语格局尚未根本改变,“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传开叫不响”的困境依然切肤。全球品牌估值机构 Brand Finance 发布的《2025 年全球软实力指数》显示,中国的软实力综合排名已跃升至全球第二(Jogodzinski, 2025),但在“媒体与传播”“治理能力”等直接关乎国家形象与国际话语权的指标上,得分依然在低位徘徊。这一冷峻的数据揭示了一个尖锐的悖论:中国的发展优势、制度优势、文化优势尚未充分转化为话语优势与传播优势。于是,如何将厚重的中国实践提炼为可对话、可共享的世界知识,如何让中国故事跨越山海,在异域的心灵中激起回响,便成为学术研究与国家战略面临的一项紧迫课题。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文后简称《决定》)旗帜鲜明地提出:“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中共中央, 2024)这一部署既是战略号角,也是对翻译研究发出的时代质询。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核心在于“说什么”,“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关键在于“怎么说”,而翻译,恰恰是贯通“说什么”与“怎么说”的咽喉要道。没有对知识本质的深刻把握,翻译便容易沦为表层语言的机械搬运;没有对传播规律的自觉认知,翻译便难以挣脱译出却未译入的宿命。

正是在这种知识渴求与传播焦虑的交织中,知识翻译学(Transknowletology)的理论价值被历史性地凸显出来。作为近年来中国学人原创的重要翻译理论范式,知识翻译学对翻译本质的认识实现了一次深邃的革命。在翻译理论的知识谱系中,知识翻译学破天荒地将“传播”推入翻译定义的内核。它将翻译界定为人类主导的、人机协同的“跨语言知识加工、重构和再传播的行为、关系、运动和规律”(杨枫, 2021: 2)。这一定义宛如一把三棱镜,折射出三个紧密相扣的层次:“加工”指向对原文知识的萃取与筛选;“重构”指向知识在异质语言文化土壤中的再组织和再语境化;“再传播”则指向知识跨语际流动的最终归宿,知识只有在传播中,才能实现自身价值。

这一理论创见的革命性远不止于术语的翻新。它将翻译从语言转换的窄室中解放出来,提升为知识流转的枢纽;它将翻译的视野从文本的对应关系拓展到知识再传播的广阔实践中。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亟须从翻译输出的惯性中挣脱,迈向知识传播的自觉。唯有如此,地方性的中国知识才能借助翻译转化为世界性的公共知识,在世界范围内获得认同。在此视域中,翻译不是国际传播完成之后的附属环节,而是国际传播得以实现的本质规定;翻译的质量直接决定中国知识文化能否有效完成从地方性到世界性的壮丽一跃。

本文以知识翻译学“五梁十二柱”理论体系为核心分析框架,聚焦其传播概念的功能定位,辨析其与翻译传播学的范式差异,揭示传播即知识建构的核心洞见,并以中国知识文化的世界性传播实践为目标,探索这一理论路径对构建中国话语体系、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启示意义。

1 “五梁十二柱”:传播何以成为翻译的本体论维度

1.1 “五梁十二柱”的理论骨架

《知识翻译学宣言》(杨枫,2021)开启了翻译研究从语言与文化向知识视角的范式转型。经过五年的深耕与淬炼,知识翻译学“五梁十二柱”理论体系于2026年正式宣告问世(杨枫,2026),标志着这一中国原创理论从宣言走向成熟的体系化建构。

“五梁”构成这一理论大厦的宏观骨架,分别对应知识翻译的存在论、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与技术论。存在之维以“地方性与世界性的张力”为核心命题,揭示翻译的根本动力源自知识的地方性胎记与其世界性渴望之间的永恒矛盾;过程之维以“去地方性与再地方性的循环”为核心过程,揭示知识从原初语境向目标语境迁移时所必然经历的双重转化,每一次传播,都是对原有地方性的剥离与新地方性的建构;脉络之维以“时间性与历史性的交织”为坐标,从海德格尔“此在”概念获得启发,揭示翻译行为始终沉沦于特定时代的知识型之中,又在历时性的传播中沉淀为新的传统;价值之维以“真、善、美的统摄”为灯塔,呼应尼采“上帝之死”后人类文明的转向,彰显翻译作为人文实践的价值追求;技术之维则以“技术物的存在模式与不确定性”为根基,将对翻译技术的省思提升到技术哲学的高度。

“五梁”并非孤立的支点,而是相互支撑、彼此浸润的有机整体。由“五梁”衍生而出的“十二柱”,涵盖话语构型、文化资本与符号权力、具身认知、旅行理论、创造性转化等12个精细化的分析工具,构成了一把能够深入解析知识跨语际流动具体机制的精密钥匙。这一体系的系统建成不仅推动了翻译研究内部的范式革新,也为中国翻译学从理论引介走向自主理论生产提供了可贵的路径。

1.2 “五梁十二柱”中的传播定位

在“五梁十二柱”的理论架构中,“传播”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本体论地位。它不是被单一维度收编的附属概念,而是如同一条隐秘的暗河,渗透在五大维度之中,成为支撑整个理论大厦的命脉。

在存在之维,“传播”表现为知识从地方性向世界性的位移。一种知识之所以渴求传播,恰恰因为它诞生于特定的语言、文化、历史与地域的襁褓之中。没有传播,地方性知识便永远被封禁在它原初的知识共同体内部,无法获得世界性的意义。在此意义上,“传播”不是翻译的附加功能,而是翻译之所以能够驱动地方性到世界性转化的根本依据。在过程

之维,“传播”落实为去地方性与再地方性的循环。这不是单向的输送,而是一种深情的转化:知识在离开母体语境的同时,必须在异质的知识空间中重新扎根、重新获得意义的呼吸。每一次成功的传播,都使原初的地方性知识在新的土壤中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这意味着没有翻译的加工与重构,知识就不可能完成从一种地方性向另一种地方性的跨域重生。在脉络之维,“传播”体现为时间性与历史性的交织。知识翻译学强调翻译行为始终被特定时代的知识型所塑造,同时又在绵延的传播中沉淀为新的传统。正如汉语学术词汇“哲学”“逻辑”“经济”等译名,是译者在反复推敲中、在历史洪流中沉淀的结晶,知识通过传播在不同时代被反复擦亮,不断获得新的理解与阐释。在价值之维,“传播”承载了“真、善、美的统摄”。知识翻译学标举“以真求知、以善立义、以美行文”的中和翻译观(杨枫等,2024:12),揭示传播从来不是冰冷的中性传递,而是价值浸润的知识实践。优质的传播使知识在不同文明之间实现“真”的澄明、“善”的对话与“美”的共享。在技术之维,“传播”涉及技术物的存在模式与不确定性。知识翻译学将翻译技术物的分析上升到技术哲学的高度,冷峻地揭示技术物背后关于知识权力的深层逻辑。传播的载体本身就是知识流转的条件,也构成传播效能的重要变量,从纸媒到数字平台,从人工翻译到人工智能,每一种技术物都在重塑知识传播的形态与边界。

由此,“五梁十二柱”体系从本体论的高度回答了“传播何以内在于翻译”这一根本追问:翻译之所以必然携带传播的基因,是因为翻译本身就是知识的跨语际、跨文化、跨体系的流动。“传播”不是翻译的外在条件或附加功用,而是翻译成为翻译的内在规定。离开传播,翻译便失去了方向;离开翻译,传播便被抽空了灵魂。

1.3 经典翻译理论中“传播”的缺席

要理解知识翻译学将“传播”郑重纳入翻译定义的理论创见,有必要回望经典翻译理论中“传播”的落寞身影。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传播”始终是翻译定义中的缺席者。

语言学派的翻译定义以奈达的“动态对等”为圭臬。奈达将动态对等翻译定义为“与源语信息最切近的自然对等”(Nida, 1964: 166)。这一经典定义以“对等”为轴心,将翻译想象为一种语言信息在另一种语言中的镜像再现。然而,译文是否真正触达受众、是否在目标文化中激起涟漪,往往被悬置在翻译行为之外。文化学派的“文化转向”拓宽了翻译的视野,勒菲弗尔(Lefevere)的“改写”理论揭示了翻译中意识形态、诗学和权力关系的操纵,正如他所断言:“翻译是最明显易识的重写类型。”(Munday, 2012: 192-194)但即便如此,翻译的外向传播维度仍未进入定义本身的核心构件,其关切的重心仍在于“转换”与“改写”。功能学派的“目的论”将受众和功能纳入考量,弗米尔(Vermeer)主张翻译是在特定情境中为特定目的而生产的文本(Munday, 2012: 122),然而“传播”在其中依然是一个辅助性的概念,未被提升至翻译本质的高度。

综观上述理论谱系,一条共通的倾向清晰可辨:在知识翻译学挺身而出之前,翻译定义中始终缺省了对“传播”的显性书写。“传播”或是翻译行为的目的论条件,或是翻译产品的社会后果,或是翻译过程中被忽略的暗影,它从未真正踏入翻译定义的内殿。“传播”在经典翻译理论中长期缺席,恰恰为知识翻译学的理论出场腾挪出了逻辑的空间,也证明了这一“显性化”的必要与紧迫。

1.4 知识翻译学对传播的显性化:从“缺席”到“在场”

正是在这一理论的静默中,知识翻译学实现了对“传播”从缺席到在场的决绝跃迁。知识翻译学不仅将“再传播”纳入翻译定义,更通过“五梁十二柱”体系为这一命题奠定了系统的理论根基。值得深沉凝视的是“再传播”中那一个并不起眼的“再”字。“再传播”意味着翻译所触及的知识,并非处于原始的混沌状态,它原本已经栖居于某一语言和文化共同体的知识场域之中。翻译的过程便是将这种已经地方化的知识重新置入传播的链条,使其在另一知识共同体中获得新的意义和新的生命。翻译本质上是知识跨语言、跨文化传播链条中的一个关键节点:它承接前一阶段的知识存在,开启后一阶段的知识流动。“再”字之中,同时凝结着“再一次”的延续与“重新”的创造,传播的延续性与传播的创造性转化,在此双重意涵中合而为一。因此,当知识翻译学试图“探究跨语言知识加工、重构和再传播的行为、关系、运动和规律”(杨枫,2021:2)时,翻译研究便实现了三重深刻的转向:从对译文的静态关注转向对知识传播动态过程的关注;从对忠实与对等的执着转向对知识从地方性走向世界性的关怀;从对语言转换的技术性考量转向对知识建构的本体论追问。“传播”终于从翻译定义的暗影中款款走出,成为照亮翻译本质的一束强光。

2 知识翻译学与翻译传播学的范式分野

2.1 翻译传播学的理论脉络与局限

翻译传播学是翻译研究与传播学交叉融合的产物,其基本路径是将传播学的理论框架移植到翻译研究的园地。这一范式聚焦翻译过程中的传播要素,试图在传播学的探照灯下审视翻译活动。它的核心关切在于翻译的传播效果:译文是否有效地将原文信息传递给了目标受众,受众的接受程度如何,传播过程中的“噪音”如何侵扰翻译效果?在这一框架中,翻译被视作信息传播行为的一种特殊类型,“翻译”与“传播”是一对并列或从属的关系,翻译的目的是实现有效传播,传播效果是衡量翻译成功的标尺。然而,翻译传播学面临的一个根本性理论困境在于,它以传播学的外部框架套裁了翻译活动的独特肌理。翻译难道仅仅是信息传播的一个子类别吗,翻译区别于一般传播行为的独特性究竟何在?当传播效果成为翻译评价的唯一准则时,翻译的知识建构功能是否被悄然遮蔽了?当传播的技术逻辑压倒翻译的知识逻辑时,翻译是否会在效率的追逐中丢失自身的灵魂?这些质问表

明,翻译传播学的工具性范式无法充分解释翻译的本质,尤其是翻译作为一种知识生产与知识转化活动的独特尊严。

2.2 “传播即知识建构”对翻译传播学的超越

知识翻译学与翻译传播学的核心分殊,在于对本体的定位截然不同。翻译传播学将翻译视为传播的一个特例,其分析框架以传播为参照系来审查翻译。这是一种外向型的理论路径,它擅长回答如何有效传播的策略性问题,却无法回答翻译为何必然具有传播功能这一本体论追问。知识翻译学则提供了别开生面的本体论框架。在此,“传播”不是翻译的外部参照系,而是翻译的内在构成要素。翻译的过程绝非中性的信息传递,而是知识在跨语际流动中持续的裂变、重构与创造。知识翻译学的逻辑链条是“知识→翻译→传播”,即以知识为本体,传播是知识存续与生长的逻辑环节;而翻译传播学的逻辑链条是“传播→翻译”——以传播为本体,翻译沦为传播行为的一种特殊类型。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从知识的内在本性出发,为翻译的传播本性提供深厚的知识论地基;后者则从传播的外部功能出发,把翻译简化为传播工具箱中的一把扳手。这一分野的深远意义在于:翻译传播学始终无法回答翻译为何内在地具有“传播”的属性,因为它总把“传播”视作翻译的外在条件;而知识翻译学从知识的地方性与世界性的辩证关系出发,指出知识首先都是地方性的,翻译就是地方性知识走向世界性知识的必经之路。“传播”不是翻译的工具性功能,也不是翻译的行为后果,而是翻译的存在方式本身。翻译之所以是翻译,正因为它使知识得以跨越地方性的藩篱,进入世界性的广阔空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翻译不仅是一个技术性的语言转换过程,更是一个知识再生产、意义再建构和权力再协商的过程(杨枫,2025:2)。

2.3 互补与超越

两种理论之间的关系,与其说是针锋相对的竞争,不如说是层次分明的互补与超越。翻译传播学擅长回答“如何有效传播”的问题:面对特定的受众与渠道,翻译应采取怎样的策略才能实现最佳传播效果?它提供了具体的分析工具与操作指南,具有鲜明的应用导向。知识翻译学则回应了一个更根本的叩问:翻译何以具有传播功能,传播何以是翻译不可割裂的本质属性?从服务构建中国话语体系、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国家战略来看,两种理论各有其用:翻译传播学告诉我们“怎么译”才能有效传播,知识翻译学则告诉我们“为什么译”本身就是一种传播。后者为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提供了根本性的理论合法性:翻译不是附加在国际传播之上的技术性工序,而是国际传播得以实现的本体论前提。知识翻译学的最大贡献在于它从知识论的高度论证了翻译与国际传播的内在统一:有效的翻译,本身就是有效的传播。

3 知识翻译学中“传播”的理论内涵

3.1 知识流转:传播作为翻译的本体论维度

在知识翻译学的理论大厦中,“传播”被赋予了沉甸甸的本体论地位。“传播”不是翻译的可选维度或附加功能,而是翻译成为翻译的内在根据。这一理念,可以从“地方性知识”与“世界性知识”的辩证关系中获得深邃的理解。

知识首先都是地方性知识。每一种知识最初都扎根于特定的语言、文化、历史与地域的泥土之中,带有不可涤除的地方性气息。地方性知识的辩护、使用和认同催生了知识的传播、积累与发展。当一种地方性知识借助翻译的舟楫漂洋过海,进入另一种语言和文化的场域,它便开始了从“地方性”走向“世界性”的转化之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知识翻译学认为“翻译就是两种地方性知识相互注视、相互拥抱、走向彼此的世界性行为”(杨枫,2022:1)。翻译与“传播”在此深度融合为一体:翻译的存在,本身就是为了知识的世界性流通;“传播”的达成恰恰是翻译成功的最终证明。从知识的地方性到世界性的转化深刻揭示了传播何以构成翻译的本质维度。试想:如果翻译只是将一种语言的知识照搬为另一种语言的皮相,而不考虑这种知识能否被目标语境所接受、理解与活化,翻译的意义何在?事实上,翻译之所以必要,正是因为知识渴望流动、渴望在不同知识共同体之间实现共享与对话。知识的地方性决定了知识的边界,而翻译打破了这一边界,使知识能够突破原有的文化和语言茧房,成为一种可以在更大范围内被理解、被使用的世界性知识。这一突破过程就是知识传播的实质性内涵。正如罗伯逊所揭示的“全球地方化”概念所昭示的,地方与全球并非二元对立,而是相互渗透、彼此建构的动态过程(Robertson, 1994: 38)。

知识翻译学进一步构建了中国知识的“去地方性—再地方性—跨地方性—世界性”的四维分析框架,系统阐释如何将中国地方性实践转化为可理解、可对话、可共享的全球公共知识(杨枫,2025:1)。这一框架超越了表层语言对应的工具性范式,嵌入话语背后的认知框架与意义体系,为国际传播的范式转型提供了崭新的分析路径。

3.2 话语塑造:传播作为翻译的社会性维度

知识翻译学对“传播”的第二重深刻理解在于:“传播”不仅是信息的跨语际传递,更是一种话语塑造与知识建构的权力实践。

知识翻译学把翻译置于不同知识共同体的历史视野和格局下考察,科学分析不同语言面对不同知识如何选择、加工、改造的实践和经验及其语言转换、概念生成等知识生产和传播的文化背景、社会条件 and 政治环境(杨枫,2021:2)。这意味着,在知识翻译学的审视中,传播从来不是一个纯洁的信息传递过程,而是一个充满了选择、突显、遮蔽与改造的话语实践,是一种在跨语际流动中重新定义世界的力量。知识在传播过程中不可能保持原样。当

一种地方性知识进入新的语言和文化场域,它必然经历某种程度的嬗变:有些被放大,有些被淡化,有些被重新编码。这不是传播过程中的失真,而是知识在不同知识共同体之间流通时必然经历的话语重构。翻译的再传播功能,正是在这种积极的、创造性的重构中实现的,它使知识在穿越边界的旅途中获得了崭新的社会生命。

从话语塑造的维度审视翻译传播,社会符号学提供了有力的理论资源。韩礼德曾精辟地指出,语言不仅是传递信息的管道,更是一种社会符号系统,它在使用中建构意义、维系或挑战权力关系,“语言主动地象征社会系统,从而创造社会系统,同时也被社会系统所创造”(Halliday, 1978: 183)。在社会符号学的视野中,翻译不是从一种符号系统到另一种符号系统的机械转换,而是意义在不同社会语境中的创造性再生成。这一洞见与知识翻译学的“话语塑造”维度灵犀相通:翻译作为一种跨语言的意义实践,始终嵌入特定的社会结构和文化语境之中,翻译过程本身就是话语权力的协商与知识范式的重构。这对于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无疑具有振聋发聩的启示:中国话语的世界化,绝非简单地将中文表述翻译成外文,而是要在翻译过程中完成话语的重构与再生成,让中国概念、中国理念在目标语境中获得可理解性和说服力,在世界知识版图中赢得一席之地。

3.3 效果生成:传播作为翻译的评价性维度

知识翻译学中“传播”的第三重面向,是其深远的评价功能。将“传播”郑重纳入翻译的本质内涵,意味着翻译的评价标准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知识翻译学在“地方性知识→世界性知识”的传播框架中,引入了“知识的世界性认同”这一全新的评价尺度:翻译成功与否,归根结底取决于地方性知识能否借助翻译的力量,在世界范围内获得有效的认可、使用与共鸣。

在实践层面,这种传播效果导向的评价标准引发了翻译伦理的深层变革。它意味着翻译活动不再仅仅追问是否译对了,而更紧要的是追问是否译通了。“通”不仅指语义的通达,更指知识的通达,一种地方性知识能否穿越语言和文化的崇山峻岭,在另一知识共同体中生根发芽、开花结实。从忠实到效果、从对等到认同的范式转型,正是知识翻译学将“传播”郑重纳入定义所引发的静水深流。这一效果生成的维度,可以从行动者网络理论中获得方法论上的借鉴。根据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任何社会行动都并非纯粹的人类活动,而是人类与非人类(物、技术、文本等)作为中介者共同编织的网络效应,这一意义重塑的过程在社会学意义上本身即被定义为一种“翻译”(Latour, 2005: 39)。循此逻辑,作为跨语言文化实践的文本翻译活动亦不例外,它同样是多重行动者(译者、原文本、翻译工具、出版机制等)共同参与、相互协商的网络建构过程。行动者网络理论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种更加注重实践过程的实证眼光,可以弥补传统翻译效果评价中对传播网络中多元行动者互动机制的忽略。在知识的世界性认同这一评价框架中,知识是否获得“认同”,是一个复

杂的网络化过程,它牵涉译者、读者、机构、媒体、技术平台、文化中介等多元行动者的共同参与与反复协商。这一视角锐利地提示我们,对中国话语国际传播效能的评估,不能止步于文本层面的“忠实度”,而必须延伸至传播网络中多方行动者的参与、碰撞与共鸣。

在知识翻译学的框架中,“传播”由此获得了三重维度的理论建构:在本体论上,它是知识从地方性走向世界性的内在逻辑;在社会性上,它是知识在跨语际流动中的话语重构与权力协商;在评价性上,它是衡量翻译成功与否的根本尺度。这三重维度相互支撑、彼此渗透,共同撑起知识翻译学中传播这一概念的完整天空。

4 中国知识文化的世界性传播实践

4.1 从“翻译输出”到“知识传播”:范式的根本转型

知识翻译学深刻地洞见,中国知识文化的世界性传播实践,首先需要完成一次根本性的观念涅槃:从翻译输出的迷思中觉醒,迈向知识传播的自觉。

翻译输出模式将翻译矮化为一种单向的信息传送:中国知识被翻译成外文、输出到海外,任务便宣告终结。这种模式的目光牢牢锁在译出了什么之上,却很少关切译入了什么,这些知识是否真正被目标受众接纳、理解、认同,是否在他者的心灵中引发深长的回响。当前我国国际传播面临“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传开叫不响”的深层困境,其症结在于长期陷入以语言转换为中心的工具性传播范式,忽视了对外传播本质上是知识生产与权力建构的过程(杨枫,2025:1)。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知识传播模式将翻译置于完整的传播链条中来理解:翻译不是知识的终点,而是知识在新的语境中获得生命的起点;翻译的成功与否,不取决于文本是否忠实于原文的皮相,而取决于地方性知识能否借助翻译的摆渡,转化为世界性知识,在世界范围内获得认可、使用与再创造。在这一范式中,翻译不再是传播完成之后的技术性转换,而是传播之所以能够实现的本体论前提。这一观念转型,正是知识翻译学对传播显性化书写催生的实践巨变。它要求中国知识文化走向世界的实践,将目光从翻译生产的车间转向传播效能的旷野,从文本质量的执念转向知识认同的关怀。惟有超越表层的语言对应,深入话语背后的认知框架与意义体系,通过创造性的知识翻译实践,才能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叙事垄断,在多元知识共同体中确立中国话语的正当性与感召力。

4.2 “五梁十二柱”中的传播实践路径

基于知识翻译学“五梁十二柱”的理论框架,中国知识文化的世界性传播可以从五个维度铺展系统化的路径建构,每一维度对应知识翻译学的一条主梁。

其一,存在之维:提炼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知识。知识翻译学指出,翻译的本真是“地方性知识→世界性知识”的转化。这意味着并非所有中国知识都天然适合或亟待走向世界。在国际传播实践中,需要精心甄选那些既饱含中国特质、又蕴藏世界意义的知识内容,

它们能够回应今日人类面临的共同困境,能够与目标受众的知识体系产生深层对话与共振。中国的发展经验、治理智慧、文化传统中蕴含着大量具有普遍价值的知识资源,需要经由翻译的加工与重构,使其转化为可被世界理解、接受和共享的知识形态。

其二,过程之维:在翻译中完成话语的再生成。知识翻译学的话语塑造维度揭示,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绝非中文表述的直译,而是翻译过程中的话语重构与再生成。从过程之维审视,翻译既是去地方性的过程,也就是将中国知识从原初语境中温柔地抽离;也是“再地方性”的过程——使其在目标语境中获得崭新的可理解性。中国政治话语中的核心概念,如“人类命运共同体”“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国式现代化”,其翻译不能停留在字面对应的浅滩,而须在深味其知识内涵之后,寻找或锻造能够在目标语境中激起共鸣的独特表达。这既需要归化的玲珑,使中国概念巧妙进入目标语的知识网络;也需要异化的风骨,保持中国概念的独特骨骼,使其成为世界知识版图中不可替代的新增疆域。翻译的过程本身就是话语建构的过程:正是在翻译中,中国话语获得它的世界性形态与灵魂。

其三,脉络之维:尊重传播的历史性与时间性。知识翻译学强调,翻译行为始终被特定时代的知识型所浸润,又在绵延的传播中沉淀为新的传统。从脉络之维出发,中国知识文化的世界性传播是一个分阶段、分层次、需耐心的长期历程,需要根据不同阶段的传播目标,采取差异化的翻译传播策略。正如戏曲西渐研究所揭示的,地方性戏曲知识走向世界,经历了“故事性、文学性与舞台性”三个认知阶段的知识迁移,每一次进阶,都意味着知识传播的纵深化与精微化。

其四,价值之维:以真、善、美统摄翻译传播的价值取向。知识翻译学标举“以真求知、以善立义、以美行文”的中和翻译观(杨枫等,2024:12)。这意味着中国知识的国际传播,不仅要执着于信息的准确抵达(真),更要致力于跨文化的深度理解与心灵共鸣(善),以及审美层面的感动与共享(美)。从价值之维出发,翻译不是冷峻的技术操作,而是承载着人文温度与价值追求的知识实践。高质量的中国话语国际传播,应当是一首知识与价值交织的复调乐曲。

其五,技术之维:审慎利用并超越技术物的传播力量。当前,人工智能技术正以雷霆之势重塑翻译传播的形态。知识翻译学将翻译技术物的分析升华为技术哲学的思考,冷峻地揭示技术物背后关于知识权力的深层逻辑。从技术之维出发,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既要积极拥抱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工具,拓展传播的广度与效率,也要警惕技术物可能带来的知识同质化与文化扁平化风险,确保技术服务于而非宰制知识的世界性传播。

4.3 典型案例分析

4.3.1 中国政治话语的对外翻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英译嬗变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重大的原创性理念,其英译经历了一场意味深长的历时嬗变。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这一概念时,英译为“human beings sharing a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Hu,2012)。随着理念内涵的不断深化与国际传播实践的深耕,译法逐渐演变为“a human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王文慧等(2024:52)的研究指出,这一翻译抉择绝非简单的措辞调换,而是对知识内涵的深度挖掘与精准再表达,后者更鲜活地传达了“共享未来”的积极意涵,更易被国际社会理解和接受。这一案例生动地印证了知识翻译学“过程之维”的核心洞见:翻译不是知识的转述,而是知识的再创造;好的翻译能够使地方性知识获得世界性的生命力。

然而,当前中国政治术语的学术英译依然面临严峻的挑战。韩子满(2024)以中国知网收录的学术论文及国家翻译文献为样本,对核心政治术语“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英译实践进行了系统剖析。研究发现,该术语的外译普遍面临规范化与标准化程度偏低的困境。具体而言,学者自发翻译多倾向于字面直译,部分译文存在明显的用词失当;而规范化缺失的积弊贯穿于各类翻译主体之中,甚至在单篇文献或专门网站的词条内,亦屡见多种译法混用的现象。究其深层原因,一方面,翻译主体多为非外语专业学者,术语翻译规范意识相对薄弱;另一方面,官方译法往往偏重解释性,弱化了术语的凝练特征,导致其难以在学术界被广泛采纳。这些外译乱象不仅易引发西方学界对中国政治术语的误读与曲解,甚至可能为恶意污蔑提供借口,削弱我国对外话语权的根基。这一发现从反面沉重地印证了知识翻译学的核心命题:翻译绝非技术性的语言转换,而是知识建构与话语塑造的过程。缺乏对传播功能的清醒自觉,即使译出了,也无法译入,更遑论在世界范围内获得深度认同。

4.3.2 中医药术语的国际标准化:知识与传播的辩证

中医药作为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的瑰丽宝藏,其对外传播是知识翻译学存在之维与过程之维交汇的典型样本。中医药知识植根于中国古代的哲学玄思、文化观念与千年临床经验,带有鲜明的地方性胎记。然而,随着针灸、中药等疗法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接纳,中医药知识正磅礴地经历着从地方性到世界性的深刻转化。在这一波澜中,术语的标准化翻译成为关键隘口。以针灸穴位命名、中药功效描述为代表的术语翻译,面临着双重挑战:一方面,需要保持与中医理论体系的内在血脉相连(守护地方性知识的完整性);另一方面,又须能够在目标医学知识体系中获得可理解性与可操作性(实现知识的再地方化)。知识翻译学的过程之维——去地方性与再地方性的循环,为理解这一双重挑战提供了精准的分析框架。中医药术语的国际标准化实践表明,成功的知识传播,需要在保持原真性与获得可理解性之间寻求一种充满张力的动态平衡。

4.3.3 非遗的跨知识传播:以京剧对外译介为例

在知识翻译学的烛照下,非遗的对外翻译被重新定义为一种知识再生产的创造性实践。京剧的对外传播,绝不仅仅是语言文字的表层转换,更是表演艺术知识、舞台美学知

识、中国文化知识的整体性再传播。传播功能的实现程度直接决定了京剧知识能否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世界性的深情认同。这一案例有力地昭示,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亟须超越文本翻译的狭窄视野,走入知识传播的广阔原野。

4.3.4 中国典籍的海外传播与知识再生产

《论语》《道德经》《孙子兵法》等中国典籍在世界范围内的漂流与扎根,是知识翻译学脉络之维的生动展演。《论语》在西方经历了从传教士译介到厚重学术译本、再到大众普及读物的多阶段传播历程。每一次新的翻译,都是对孔子思想在特定历史语境中的一次再激活。从19世纪理雅各的学究式译本到20世纪以来各种面向大众的现代译本,翻译策略的嬗变反映了不同时代西方知识共同体对“中国智慧”的需求变化。正如知识翻译学时间性与历史性的交织所揭示的,知识通过传播,在不同时代被反复擦亮,不断获得新的理解与阐释,经典的生命力,恰恰系于这种持续的传播与无尽的再创造。

4.3.5 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知识翻译学考察

以莫言作品的外译为例,葛浩文的翻译实践淋漓尽致地体现了知识翻译学价值之维与过程之维的融会运用。葛浩文在翻译莫言作品时,从不执着于逐字逐句的僵死对应,而是在深味中国乡土文化知识之后,进行创造性的重构与再传播,使中国乡土的血肉经验,转化为具有世界性共鸣的文学知识。莫言摘取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不仅是个人文学成就的加冕,更是中国乡土知识通过翻译进入世界文学知识体系并获得世界性认同的标志性事件。这一案例从正面雄辩地印证了知识翻译学的核心命题:优质的翻译能够使地方性知识获得世界性的灿烂生命。

5 知识翻译学与中国话语国际传播的理论自觉

5.1 理论自觉:翻译作为国际传播的本质构成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中共中央,2024),这既是对国际传播工作的战略擘画,也是对翻译研究下达的时代问卷。知识翻译学作为唯一将“传播”庄严纳入翻译定义的理论体系,为回应这一命题提供了独一无二的理论火种。知识翻译学的核心理论贡献在于它为翻译的传播功能修筑了深厚的知识论地基:翻译之所以天然携带传播的基因,根源在于翻译本身就是知识跨语言流转与跨文化生成的内在机制。“传播”不是翻译的工具性功能,而是翻译的存在方式。这一见解为中国话语国际传播提供了根本性的理论合法性,翻译不是国际传播的辅助工序,而是国际传播的本质构成。在方法层面,知识翻译学将翻译传播研究的焦点从传播效果的浅滩引向知识建构的深海,从受众接受的末端引向知识的世界性生成的源头,开辟了一个将翻译与知识生产、话语建构、价值创造相连接的崭新学术方向。

5.2 效能提升:从“知识认同”到“话语权力”的价值跃迁

知识翻译学揭示了翻译与传播的血肉一体:翻译本身就是一种深度的知识传播实践,有效的翻译本身就是有效的传播。这一理论洞见为中国话语国际传播效能的跃升标注了新的航标。当前国际传播效果评估面临着理念滞后、透明度不足等结构性困境,传统的线性评估模式难以适应多元叙事博弈的混沌环境。“覆盖即效果”“声量即效果”的认识误区,使评估工作无法准确反映在话语权争夺中的真实表现(刘苏仪等,2025:37)。华中科技大学发布的《2024—2025 中国故事国际传播效能指数报告》^①依托“关注度、覆盖度、美誉度、参与度”四大核心指标,对国际主流社交平台上的中国故事传播效能进行了系统评估,为客观描摹传播图景、精准优化策略提供了科学依据。知识翻译学则为传播效能评估提供了更为深沉的理论框架。从知识翻译学价值之维出发,中国话语国际传播的终极目标不应止步于被看到或被听到的表层喧嚣,而应矢志追求在多元知识共同体中赢得知识的世界性认同。在此基础上,实现从被动回应到主动定义的国际话语权根本性跃升,才是中国话语国际传播的价值归宿。

知识翻译学“五梁十二柱”体系的灵魂价值在于,它将翻译从语言转换的浅滩,提升至知识建构的高地,从而揭示了翻译与国际传播的血脉统一,翻译本身就是知识传播实践,有效的翻译本身就是有效的传播。在知识全球化与文明互鉴蔚为时代命题的当下,知识翻译学所开拓的这一理论路径,不仅为翻译研究本身注入了澎湃的新活力,也为理解人类知识的跨语际流动、为中华文化深稳地走向世界,提供了一个胸襟开阔、解释锐利的思想框架。当知识不再封藏于地方性的孤岛,当“传播”不再等同于信息的搬运,翻译便真正成为文明在互鉴中生生不息的隐秘心脏。

参考文献:

- 韩子满. 2024. 术语外译的国家翻译与学者翻译: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例[J]. 外语导刊(6): 53-61+71+156.
- 刘苏仪, 曾庆香. 2025. 叙事博弈效果评估:国际传播效果评估机制的范式创新[J]. 对外传播(8): 37-41.
- 王文慧, 王银泉. 2024. 外语课程思政与对外话语构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英译为例[J]. 当代外语研究(2): 45-57+193.
- 杨枫. 2021. 知识翻译学宣言[J]. 当代外语研究(5): 2+27.
- 杨枫. 2022. 知识的地方性与翻译的世界性[J]. 当代外语研究(3): 1-2.
- 杨枫. 2025. 从地方性到世界性: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范式转型与国际话语权构建[J]. 当代外语研究(6): 1-9.
- 杨枫. 2026. 种子与大地的约定——从“知识翻译学宣言”到“五梁十二柱”理论体系构建[J]. 当代外语研究(2): 1-8.
- 杨枫, 李思伊. 2024. 真善美:作为方法论的中和翻译[J]. 中国翻译(1): 9-15+189.

① 该报告由陈先红教授团队于2026年1月29日在“2024—2025 中国故事国际传播效能指数报告新闻发布会暨国际传播与公共关系圆桌论坛”上正式发布,详见 <https://hb.chinadaily.com.cn/a/202601/30/WS697c7967a310942cc499d914.html>。

- 中共中央. 2024.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N]. 人民日报, 07-22, 第1版.
- Jagodzinski, Konrad. 2025. Global Soft Power Index 2025: The shifting balance of global Soft Power[EB/OL]. [2026-07-14].
<https://brandfinance.com/insights/global-soft-power-index-2025-the-shifting-balance-of-global-soft-power>.
- Hu Jintao. Firmly March on the Path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Strive to Complete the Building of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Report to the Eighteen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n Nov 8, 2012[EB/OL]. *Global Times*. 2012-11-18. [2026-09-10]. <https://www.globaltimes.cn/content/744889.shtml>.
- Halliday, M. A. K. 1978. *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 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Language and Meaning*[M]. London: Edward Arnold.
- Latour, B. 2005.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 Theory*[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unday, J. 2012.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3rd ed.)[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Nida, E. A. 1964. *Towards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Principles and Procedures Involved in Bible Translating*[M]. Leiden: E. J. Brill.
- Robertson, R. 1994. Globalisation or glocalisation?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1):33-52.

The Functional Positioning of “Communication” in Transknowletology: With a Concurrent Discussion on the Pathways to Enhancing the Efficacy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Communication

YANG Feng YAN Chengji

Abstract: Within the theoretical genealog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Transknowletology stands as the only system that explicitly incorporates “communication” into the very definition of translation. Taking the “Five Beams and Twelve Pillars” framework of Transknowletology as its analytical len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functional positioning of “communication” in knowledge translation, delineates its paradigm divergence from Translation Communication Studies, and reveals its core tenet of “communication as knowledge construction.” On this basi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pivoting on knowledge circulation, discourse shaping, and effect generation is constructed. With the global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knowledge and culture as its objective, the paper further explores how Transknowletology furnishes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pathways for building China’s discourse system and enhancing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efficacy.

Key words: Transknowletology; Five Beams and Twelve Pillars; translation communication; China’s discourse system;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efficacy; worldliness of knowledge

责任编辑:龙丹